

不仅艺术界对宋徽宗的书画艺术成就进行了肯定,近年来,史学界在否定其政治作为的同时,对其书画艺术进行了探讨并做出了公允的评价。滕新才《宋徽宗评议》(《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认为宋徽宗之所以沉溺于花石、丹青,是因为他的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激烈的党争使他感到厌烦,因而转向丹青等追求精神寄托,他对繁荣中国书法、绘画艺术,整理古代书画典籍,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宋徽宗是一个幼稚的改革者和卓越的书画家。这一评价基本切合宋徽宗的生平及其历史影响。西方学者对于宋徽宗及其时代也在重新评价,充分肯定了其在艺术上的伟大成就,如《徽宗与北宋后期:文化政治与政治文化》(Emperor Huizong and Northern Song China——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伊佩霞、Maggie 编,哈佛东亚中心,2006)。

总之,宋徽宗赵佶作为一个皇帝,作为政治家,他是失败的,由于生活腐化,宠信佞臣和沉迷于宗教和丹青花石,葬送了自己的大好河山;但是作为皇帝,他的爱好和重视,使其统治时期的艺术文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对我国的绘画、书法等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对于宋徽宗的研究,不仅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对书画艺术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以往的研究艺术界着力较多,而历史学界的研究相对薄弱,因此,以后历史学界应该从各方面对宋徽宗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亡国皇帝进行研究,并对其在书画艺术上的成就做出更为合理公允的评价。

## 丘处机研究综述

刘永海

(唐山师范学院政史系 河北唐山 063000)

丘处机对于全真教史而言,重要性不言而喻。近30年来,随着道教及全真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相关研究愈发深入,出版专著十几种,发表论文逾一百四五十篇,俨然形成专门的“丘学”。2007年,由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鲁东大学胶东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山东省栖霞市丘处机研究会承办的“丘处机与全真道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栖霞召开。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的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大会。丘处机研究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共收到与该议题相关的学术论文10多篇。

本文将从以下方面对丘处机研究论著进行综述。

### 一 综论丘处机生平行迹、传道经历的著述

这方面的研究始于光绪年间陈教友的《长春道教源流》。该书共八卷,卷二、卷三为丘处机事迹汇编。此书虽非丘处机研究的专书,且作者身为教内中人,择取材料免不了有失客观,

但是仍可视作丘学研究的奠基之作。此后,专门研究丘氏事迹的著述相继问世。姚从吾《丘处机年谱》(《东北史论丛》,台北正中书局,1959年)采摭广泛,征引宏富,实为丘学研究所必备。较为重要的还有朴庵《长春真人丘处机》(台北《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14卷12期,1981年)、周绍贤《道教全真大师丘长春》(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王民信《丘处机》(《中国历代思想家》三一,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萧进铭《丘处机年谱与传略》,较上述著述更为全面。

近些年来,几种丘处机的传记相继出版。唐代剑《王嘉·丘处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是全面研究两位全真教主的力作,该书将丘氏生平概况为“从孤儿到名道”、“西觐成吉思汗”、“全真教的兴盛”等阶段,勾勒出其人生轨迹。另有赵益《丘处机——一个人与一个教派的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分“生前事”、“身后事”两部分。前者述丘处机拜师、苦修、西行诸事,后者讲丘氏后全真教之盛衰。周晓红《丘处机传》(京华出版社,2002年),分“百年乱世”、“祖师神迹”、“出关度弟子”、“励精图治”、“龙门潜修”、“出山立教”、“一代天骄”、“觐见大汗”、“千秋功过”八部分,述丘处机事迹颇详。另有赵卫东《丘处机与全真道》(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张晓松《丘处机大传》(青岛出版社,2005年),皆能在扎实资料的基础上,对丘处机给予客观公正的叙述。

除了对丘氏一生进行整体考察外,学界对其人生某个阶段、具体事件也较重视。舒天啸在《中国道教》陆续发表《长春丘真人“磻溪六年”述略》(1995年第3期)、《长春丘真人“龙门七载”述略》(1996年第3期)、《长春丘真人“振教祖庭”述略》(1999年4期)三篇文章,介绍丘处机在磻溪、龙门及住居终南祖庵时的事迹和传教经历。张文主编《丘处机与龙门洞》(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论述丘处机在陕西龙门等地传道行迹。赵卫东《丘处机早期活动中的几个问题》(《中国道教》2005年第1期)对丘处机父亲去世的时间、拜师前是否读书、拜师的具体地点加以考证。吉云经过实地考察和已有资料参照比较,访得丘氏在崂山留下的摩崖石刻诗四十首、词一首,有关的圣旨刻石两方,丰富了丘学研究的史料(《访丘祖在崂山留下的遗迹》,《中国道教》1988年第1期)。朱越利《有关早期全真教的几个问题》(《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冬之卷)解决的是丘处机西行的动机、主观条件、早期全真教的内丹术、王重阳与钟吕的关系等问题。

有关丘处机研究的资料整理工作也卓有成效,比较典型的是《全真道文化丛书》之《丘处机集》(齐鲁书社,2005年),汇集了道教典籍、史学著述、方志、碑刻等资料中有关文献。

## 二 关于《长春真人西游记》的研究

《长春真人西游记》乃丘处机弟子李志常所撰,作为研究丘处机的第一手史料,起初流传并不广。直到乾隆六十年(1795),钱大昕从苏州玄妙观《正统道藏》中借抄出来,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200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该书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首先,对该书校、注、译等基础性研究。1915年丁谦《长春真人西游记地理考证》,是较早的考地之作。王国维1926年作《长春真人西游记注》二卷(二书皆收入严一萍《道教研究资料》第二辑,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以详博知名,精于考辨,共有注解174条,但释地不足。

近人张星烺《长春真人西游记》注本(《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中华书局,1978年)参考王国维的成果,有注解127条,且弥补了王书释地不足的缺憾,但在事实考证上仍有疏略之处,如以“王嘉”为“王嘉”之类。香港的历史地理学家陈正祥的《中国游记选注》,则特别详细,还附有地图,尤为可贵(《中国游记选注》第一集第三篇,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79年)。纪流的《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中国旅游出版社,1988年),对《长春真人西游记》、《玄风庆会录》两部重要文献作了注释和译文。书后附有王重阳传、丘处机传等。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汇集众说,对前人诸多讹谬有所指正。国际汉学界对此书关注甚早,1866年就有俄国传教士帕拉丢斯(Arch. Palladius)的俄文译本,注解有600条之多。1910年,俄人布瑞提施奈得(E. Bretschneider)的英文译本,释地详博,而未免错误,且亦稍显陈旧;俄人克利门次(Klements)注本,对蒙古境内考释特详(参见姚从吾《元丘处机年谱》,第240页)。

其次,对该书内容的阐发。唐明邦《一言止杀,功垂万代——读〈长春真人西游记〉》(《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1期)讴歌了丘处机对华夏族之功勋,阐释了其救世度人思想。钟婴《〈长春真人西游记〉述评》(《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从“游记”的角度,剖析其文学价值、道教审美色彩、史料价值。詹石窗《南宋金元道教文学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探究了《长春真人西游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指出“劝善安民”为其核心思想;据实而录的朴实艺术手法,又决定了其丰富的史料价值。杨建波《道教文学史论稿》(武汉出版社,2001年)和梅新林、俞樟华《中国游记文学史》(学林出版社,2004年)则强调了《长春真人西游记》在中国古代游记中的突出地位。刘华以《长春真人西游记》为依托,分析了西行路上丘处机的人格特征及其道家情趣与境界(《丘处机和他的西行记——中西部古文化交流的重要典范》,《河南图书馆学刊》2002年第4期)。

《马可·波罗行记》和《长春真人西游记》可以说是元代最具代表性的两部游记,李小波、袁霜凌对二者作了对比研究,分析了当时旅行者行为特征与地理视野的差异性(《马可·波罗东游与长春真人西游——旅游者行为特征与地理视野差异性研究的典型个案》,《人文地理》2004年第5期)。盖建民《丘处机与〈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地理学价值》(《崑崙山与全真道:全真道与齐鲁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认为该书的地理学价值弥足珍贵,它以精炼的笔触描述了13世纪蒙古高原、西域及中亚一带的自然景观。

### 三 有关丘处机的道教理论、宗教思想、美学思想以及科学、教育实践等方面的研究

第一,关于丘氏修炼、养生诸方面思想的研究。唐代剑《王嘉·丘处机评传》中指出,丘处机内丹思想有三大特点:将三教圆融贯穿其中;充分体现“我命在我不在天”的主观能动性;方法简明,便于宗教实践。郭武认为丘处机的道教思想主要有“山川皆属道生涯”的唯心主义宇宙观,世事无常、得道成仙的宗教人生观,人当行善积德的伦理思想等(《丘处机道教思想述评》,《宗教学研究》1994年第1期)。萧进铭《丘处机回光说的内涵、渊源及发展——兼比较禅宗的“回光返照”说》(《丹道文化》第28、30期,台北丹道文化教育基金会,2003年)以丘处机的回光说作为立足点,往上追溯至王重阳、老庄等人的相关见解,往下则将《金华宗旨》一

书,看作是道家回光说的重要总结。赵卫东《丘处机养生思想略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认为丘处机为了解决全真道养生与成仙之间的矛盾,提出了顺任自然、清心寡欲、炼养合一、德养结合等养生思想,从而把成仙与养生统一起来。张思齐探讨了丘处机对金丹派南宗的继承与发展等问题《论丘处机对金丹派南宗的继承发展及其文学表达》,《道韵》第七辑(2000年)。赵卫东以丘处机的著作为例,研究了龙门派内丹思想的相关问题《由丘处机到〈太乙金华宗旨〉——全真道龙门派内丹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道学研究》总第十二期,2008年)。任宗权《丘处机与全真道教戒律的兴起》介绍了早期全真道戒学延流、丘氏戒学思想、丘处机与龙门律宗(《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二,关于丘处机对儒、释、道思想的吸收与融摄。崔理明《长春祖师对老子大道的继承与实践》(《崑崙山与全真道》)在本源之道、心性觉悟、命功修炼、慈心济世、政治影响等方面分析老子大道的基本原理以及丘祖对大道的完美实践。丁原明认为丘处机的道教思想具有浓重的老庄情结,其“道生”论、“清心寡欲”论、“逍遥”论,将老庄哲学与其修心积功的修炼理论相结合,为全真教注入了理性因素,又促使其向世俗化发展(《丘处机道教思想中的老庄情结》,《东岳论丛》2003年第6期)。

杨善友、车轩《丘处机的三教合一思想》(《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1期)强调融道、儒、释为一炉是全真教一贯的宗旨与特质,而丘处机赋予了“三教合一”以新意,既丰富了全真教思想,也促进了传统道教的变革。颜炳罡从宇宙观、天人关系等方面研究了丘氏思想中的儒家特色(《论丘处机思想中的儒家倾向》,《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强琛以万松行秀、耶律楚材和丘处机为例探讨了金末元初儒释道三教的关系,指出各派在当时高唱三教合一,虽然有其现实利益的考虑,但从更深层次而言,儒释道在人之为人的全面发展中有了结合的可能(《略论金末元初三教关系》,《长江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柳存仁在《道教史探源》中认为“丘处机并没有撰写关于三教的作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5页)。对此,左洪涛提出了不同看法,说丘氏既有关于儒家的作品,又有关于佛教的作品(《丘处机有关三教作品论略——兼与澳大利亚柳存仁先生商榷》,《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第三,关于丘处机的美学思想的探讨。申喜萍《丘处机的美学思想试探》(《宗教学研究》2002年第3期)从社会内容美、内丹模糊美两个侧面研究了丘处机的美学思想。余虹《丘处机“济世”人格的审美意蕴——全真道审美人格建构》(《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4期)通过对丘处机“济世”人格的剖析,探求全真道的宗教美学思想。认为丘处机“济世”人格的形成是其立足道教,吸纳儒家思想的结果,包蕴着深刻而丰富的人文内涵,体现出全真道以善求真、以善合真、真善结合的审美追求。

第四,关于丘处机的社会思想、和谐思想的研究。钟海连《早期全真道社会思想的演变及其原因初探——以王重阳、丘处机为中心》(《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认为王重阳创教之初,其社会思想具有明显的出世特征。丘处机掌教时,其社会思想有着鲜明的积极入世特点。周立升探讨了丘处机的和谐思想,认为其和谐观体现在自然和谐、社会和谐、人际和谐与身心和谐四个方面(《长春真人的和谐观》,《鲁东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吴成国《丘处机和谐观与老庄思想论略》(《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3期)从“道生天地”与自然的和谐、“清心

寡欲”与人的和谐、“一言止杀”与社会的和谐等角度,论证丘处机和谐观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老庄那里。

第五,关于丘处机在科学史、教育史上的贡献。张廷《蒙古帝国与科学——初探〈长春真人西游记〉中的科学与技术》以《长春真人西游记》为基础,辅以其他的著作与相关记录,如《玄风庆会录》、《大丹直指》,从科学、技术的视野,修正了丘处机传统上被视为“旅行家”,或是“宗教家”的看法(《中华科技史学会会刊》第7期,2004年)。杨润梅指出,丘处机亲临海上不断实践,肯定了潮汐涨落的原因是随月的变化而涨落的,提出了“海潮应月而生”的观点。在科技史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浅谈丘处机潮汐说的科学性》,《宗教学研究》1991年Z2期)。邓红蕾从智育、德育、美育几个发面总结了丘处机道教教育的思想特色(《论丘处机道教教育文化学的思想特色》,《教育史研究》1997年第3期)。

#### 四 关于丘处机对道教传播和教团发展贡献的研究

李远国对丘处机创立全真教会社、拜谒成吉思汗以及发展全真教的事迹进行了归纳(《长春济世有奇功——论丘处机对全真道的贡献》,《中国道教》1997年第1期)。张应超研究了全真教曲折的发展历程和丘处机对全真教的贡献(《简论丘处机传道中对全真道发展的贡献》,《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4期)。他的《丘处机与全真道》(《唐都学刊》1993年第3期)通过对丘处机一生弘道活动的剖析研究,从教内外诸方面论述了丘处机在全真道的创建、开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其贡献。

李培适《全真教丘处机与故乡的文教关系》(《察哈尔省文献》1982年第10期)论述了丘处机对宣化一带全真教发展的贡献。麻天祥《丘处机二入关中与全真道的发展》(《人文杂志》1992年第2期)梳理了丘处机曾两度居关中,长达十四、五年的事迹。并指出,这一时期丘处机弘化教义、结纳士流,在组织上和政治上扩大全真派的影响,为全真派在全国的发展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尹志华《丘处机与全真道在燕京的发展》(《中国道教》2005年第6期)记述了丘处机辞别成吉思汗东返后,栖于燕京,大辟玄门,使全真道在燕京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张文澍《丘处机的西游与白云观》(《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2期)叙述丘处机西行觐见经过,介绍了白云观的来历、沿革及今天观内规制。杨建波、杨志翔通过丘处机与武昌长春观的关系,肯定了丘处机对全真道在湖北传播的贡献(《学习与实践》2004年第1期)。

#### 五 关于丘处机西行之举对蒙元政治、社会影响的研究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重大影响的研究持续不断,相关成果较为丰富。

姚道冲《丘处机与成吉思汗》(《亚洲研究杂志》第46卷第1期,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86年),姚从吾《略论丘处机在金元之际对于保全中华民族与中原文化的贡献》、《成吉思汗信任丘处机这件事对于保全中原传统的贡献》(《姚从吾全集》第6集,台北正中书局1982年),核心观点即丘处机乃自救救人之宗教家,对保全中原文化贡献颇大。朱耀廷《西征路上

成吉思汗为什么要会见长春真人》(《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认为丘处机之所以倾心于成吉思汗,是看到金和南宋的统治者都难于救世,而成吉思汗却是“天启”雄主,自己的主张可以通过他去变成现实。邵俊峰探讨了丘处机西行的原因、价值(《论长春真人与成吉思汗的会见》,《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93年第1期)。方衍、贾书梅《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认为“忧民为世务”是丘氏西行的第一目标,同时也有开化度人,发展全真的目的(《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6期)。吕锡琛《评成吉思汗召丘处机论道》(《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分析了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西行论道的历史背景及政治目的,论述了丘处机对成吉思汗的劝诫及其历史意义。吕锡琛《论丘处机西行论道及其社会意义探析》(《中国道教》2003年第1期)深化了自己的观点。赵文坦梳理了征召丘处机的原因、丘处机觐见的动因以及丘处机对成吉思汗和蒙古军队态度的转变(《成吉思汗与丘处机关系辨析》,《东岳论丛》2009年第10期)。晓红指出丘处机在雪山论道过程中的劝诫,对“汉法”的采用、全国的统一,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论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论道的历史特质》,《山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刘直《丘处机与成吉思汗》(《二十一世纪中国道教展望——茅山中国道教文化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01年)介绍了丘处机西游中亚谒见成吉思汗的原因和经过,论述了成吉思汗善待丘处机的原因。张忠堂围绕《成吉思汗皇帝赐丘处机手诏碣》缅怀了丘处机对全真道发展的重要贡献(《成吉思汗三请丘处机》,《中国道教》2005年第2期)。纪流的《长春真人万里传道成吉思汗》(《炎黄春秋》1994年第9期)叙述了丘处机远赴雪山讲道的背景、经过、内容等。此外,还有罗伟国《成吉思汗与丘处机》(《上海道教》1997年第4期)等论文。殷诚安对丘处机觐见途中经历的“窝里朵”作了考证,认为具体地点在今蒙古国哈瑞河入色楞格河附近(《丘祖西行所经“窝里朵”考》,《中国道教》2006年第5期)。

如前所述,对丘处机西行及其传道等活动,学者们评价很高。刘焕玲《全真教丘处机行道教世及其贡献》(《道教学探索》第4期,1991年)对丘处机传道的影响作了系统研究。朱越利《丘处机对民族团结和元朝统一中国的贡献》(《中国民族报》2004年3月13日)认为丘处机不仅对道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客观上还促进了民族交融和元朝统一中国。安作璋认为丘处机对历史的贡献主要有四个发面:对全真教发展、对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对中国统一与历史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发展(《略论丘处机的历史贡献》,《鲁东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牟钟鉴《丘祖精神不朽》(《中国宗教》2004年第5期)指出,我们应当学习丘祖追求真理的精神,博爱济世的精神,自强无畏的精神,质朴无华的精神,宽厚海涵的精神。刘凤鸣也认为,肯定丘处机为平息战乱、拯救百姓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和卓越贡献,不仅是要给丘处机以正确的评价,也是要倡导以人为本、尊重生命、敬天爱民、包容和谐这样一种精神(《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丘处机远赴成吉思汗行营的动因》,《鲁东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舒天啸《万里西行,一言止杀》(《宝鸡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讴歌了丘处机西行之举对中国民族宗教文化所做的贡献。翟如潜的《丘处机的历史贡献》(《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认为丘处机最大的历史贡献是把宗教活动与解除人民的苦难联系在一起,并为之奋斗了一生。叶至明《重走丘祖西行路,再探全真之精神》(《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将丘祖西行精神归纳为审时度势的务实开放精神;博爱仁厚的济世精神;心底无私,为正义事业无畏无惧的进取精神;信仰坚定,不怕吃苦的精神。

朱亚非的《论丘处机》对丘处机的多方面成就作了总结,指出丘处机是著名的宗教领袖和思想家,创新了“三教合一的理论,向成吉思汗等蒙元统治者宣传济世安民思想,有力地推动了元朝某些统治政策的调整与改革,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文史哲》1998年第3期)。

有的学者认为,学界对丘处机西行历史功绩的研究有过分夸大的倾向,至于“一言止杀”之事,更令人生疑。杨讷《丘处机“一言止杀”辨伪》(《揖芬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提出质疑,但未受到学界的重视。杨讷又在2007年第1期《中华文史论丛》发表三万字长文《丘处机“一言止杀”再辨伪》,从考辨与解读最早的资料入手,循迹而下,揭示“一言止杀”故事的产生与发展过程,证明它不过是丘处机后继者炮制的谎言而已。

## 六 对丘处机著述的研究

丘处机留下了《磻溪集》、《青天歌注释》、《大丹直指》等著述,对其存留作品尤其是诗文著述的研究是学界一大热点。

首先,对《磻溪集》研究。《磻溪集》是丘处机的重要诗词集,收诗词近500首。黄兆汉《丘处机的〈磻溪词〉》(《道教文化》第4卷第4期,1986年)对其价值其加以剖析。王玉良详细考察了丘处机《磻溪集》的版本源流(《丘处机〈磻溪集〉、马祖常〈石田先生文集〉、虞集〈道源类稿〉三种》,《文献》1986年第3期)。朱越利对《磻溪集》诸多作品的创作时间作了考释,详詹细密,令人信服(《〈磻溪集〉创作时间考释》,《文献》1994年第3期)。徐翠先《体道与诗的结合——读丘处机的〈磻溪集〉》(《忻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指出,丘处机《磻溪集》中的诗歌,无论什么题材,都是为了表现诗人对“道”的体悟及其修心养性的深刻感受。刘嗣传《悟道咏道之绝唱——读丘祖〈磻溪集〉后》(《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12期)从该诗集中丰富的道学思想,虚静、清淡、冲和的美学追求和文学艺术上独特的风格及承上启下的价值作分析,获得对当代全真道的启迪。舒天啸对《磻溪集》的词牌别名加以系统阐释(《长春丘真人〈磻溪集〉词牌别名释解》,《中国道教》2002年第1期)。石玲对《磻溪集》以诗词形式表现道心的特点进行了探索(《丘处机〈磻溪集〉:道心的诗式表达》,《昆仑山与全真道》)。

其次,对丘处机道教词的意蕴、艺术特征的研究。这一领域中,左洪涛的成果比较集中。他根据相关文献资料,结合丘处机的生平及宗教活动,对其道教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认为其词作主要表现了全真道内修心性,外修功行,三教合一等宗教思想(《论丘处机的道教词》,《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他的《丘处机道教词思想探析》(《湖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又作了进一步深化。他还对丘氏道教词表现的苦修思想进行了考察(《从丘处机道教词看其苦修》,《天津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论丘处机道教词的苦修思想》,《中国道教》2002年第6期)。他对丘处机道教词所体现的内外双修思想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论丘处机道教词的内外双修思想》,《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2年第9期)。还对丘处机《无俗念·灵虚宫梨花词》、《无俗念·枰棋》、《无俗念·月》三首词作了解读(《活神仙丘处机的三首咏物写景词赏析》,《名作欣赏》2008年第5期)。其专著《金元时期道教文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六章探讨了丘处机生平及其道教词,介绍了其一生及其重要的著作,分析了其词作

的主要内容和艺术特点。

徐翠先认为丘处机的诗表现了其坚定不移的宗教信仰,把修道体验和审美感兴融合起来,有一定的独特性(《金代全真教诗人丘处机诗歌创作初探》,《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李闻对丘处机词的内容、审美风格、作词目的等方面进行分析(《从道士词向文人词的转变——丘处机词略论》,《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

郭文睿等人探讨了儒家思想对丘处机诗歌创作的影响,揭示了丘处机的诗歌创作成就的原因(《论儒家思想对丘处机诗词创作的影响》,《科技信息》2009年第14期)。郭文睿等《丘处机诗词艺术探微》从三教合一思想、文人化倾向两个角度总结了丘处机诗词的艺术特征(《科技信息》2008年第34期)。杨怀源《丘处机诗词用韵研究》认为丘处机的诗词用韵反映了当时的实际语音,与略后于他的元好问的古体诗、词用韵韵系相同,可以归纳为18部(《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在栖霞时期,丘处机写下大量记游诗和山水诗,诗中的纪事部分,可作史料。朱越利选择丘处机在栖霞时期的记游诗和山水诗,从成仙思想、劝人归隐、教务活动、爱民思想、钟吕和斋醮六方面,揭示了丘处机的内心世界和思想(《读丘处机栖霞时期的记游诗和山水诗》,《问道崑崙山——齐鲁文化与崑崙山道教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9年)。徐翠先研究了丘处机山水诗的象喻性,认为丘处机修道的特点是观物体道,使其诗作具有丰富的内涵,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去欣赏(《论丘处机山水诗的象喻性》,《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王洞真、李瘦卿《丘处机及其咏崑崙山诗词》(《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对丘处机咏崑崙山诗词加以搜集,得40余首。杨怀源、匡腊英从诗词格律的角度对马钰、丘处机诗词中的27条异文进行校订(《云梦学刊》2009年第3期)。

再次,对丘处机其他作品的研究。赵敬阳《丘处机佚著〈鸣道集〉考略》(《中国道教》2006年第3期)通过史料推论,《鸣道集》所收应为大安元年(1209)后丘氏之诗文,该书亡于元明兵革之际。赖炜芳、黄永锋《丘处机〈摄生消息论〉析略》(《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三辑,三联书店,2008年)集中发掘丘处机《摄生消息论》的养生思想。论证该书主要以四时消长为出发点,将人体五脏的消长变化与四时、五行、五方、五味、五臭、五色等联系起来,形成了复杂的天人一体的思想体系;以此分析不同季节的起居、饮食、精神调养、防病治病等,并对老年养生做了特别的论述。对托名丘处机的作品,学者们也进一步加以澄清。戈国龙对署名丘处机的《大丹直指》作者进行考辨,认为该书非丘氏所述,乃全真后学得施真人所传丹书后所伪托(《〈大丹直指〉非丘处机作品考》,《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3期)。

综上所述,学界对于丘处机的研究呈现如下特点。第一,研究领域广泛。涉及到丘处机生平经历、道教思想、社会思想、社会影响及本人著述、相关史料等多方面内容。第二,研究重点突出。多年来,丘处机西行觐见的背景、过程、影响、意义以及《长春真人西游记》等论题受到持续关注,对于丘学的深入发展、弘扬全真精神无疑起着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在丘学研究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一是应该加强文献研究,涉及到丘处机的文献不仅仅局限于《长春真人西游记》、《磻溪集》等,还应在同时代士人、道者的相关资料中去爬梳整理。二是对丘处机西行论道、传道以及对社会的贡献等问题的论述要有理有据,把握尺度要准确,不可含糊其辞或加上主观臆测成分。